



闫欢 等◎著

积极网络舆论 引导论

会科学出版社



闫欢 等◎著

积极网络舆论 引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积极网络舆论引导论 / 闫欢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203-0099-5

I. ①积… II. ①闫… III. ①互联网络-舆论-研究-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7748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280千字

定 价 8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言 积极网络舆论：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媒介实践·····	(1)
一 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理论溯源·····	(2)
二 公民美德的理论溯源及其对促进舆论互动的主体 价值·····	(7)
第一章 作为积极网络舆论主体的积极传播者·····	(10)
第一节 积极受众观的历史脉络·····	(10)
一 传播学批判学派视野中的消极受众·····	(11)
二 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积极受众观缘起·····	(14)
三 批判视野中的积极受众·····	(16)
四 积极受众观的发展·····	(20)
五 受众研究的实践转向·····	(22)
第二节 积极传播者：转型社会中的积极舆论主体·····	(26)
一 心理学视野中的从消极个体到积极主体·····	(27)
二 积极舆论主体的基本特征·····	(28)
三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积极主体·····	(31)
四 幸福指数拐点下的积极主体·····	(33)
五 积极舆论主体的界定·····	(34)
第二章 积极舆论主体的实现论媒介动机·····	(37)
第一节 实现论与实现幸福感·····	(37)
一 哲学与心理学视野中主体的自我实现·····	(38)
二 积极舆论主体的实现幸福感·····	(38)
三 积极舆论主体的实现论媒介动机测量·····	(41)
第二节 作为积极舆论主体的大学生实现论媒介动机的实证	

研究	(43)
一 问卷的发放与分析情况	(43)
二 大学生实现幸福感水平分析	(46)
三 作为积极舆论主体的大学生实现论媒介使用动机总体 情况分析	(48)
四 作为积极舆论主体的大学生实现论媒介使用动机的人 口学变量分析	(55)
五 作为积极舆论主体的大学生实现幸福感与实现论媒介 使用动机的相关性分析	(60)
六 大学生实现幸福感水平与实现论媒介使用动机的差异性 分析	(63)
七 研究启示与不足	(66)
第三章 新型主流媒体的积极社会制度框架与舆论引导	(68)
第一节 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历史脉络与现实需求	(69)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的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观 ...	(69)
二 网络舆论引导的现实需求	(71)
三 主流媒体官方微博舆论引导中存在的问题	(73)
第二节 新型主流媒体的积极社会制度媒介框架与主体舒适度 指标	(76)
一 主流媒体促进积极社会制度的形成及其积极影响	(77)
二 主流媒体中的积极社会制度框架与积极舆论主体的 舒适度指标	(80)
第三节 主流媒体的积极社会制度框架的研究设计	(86)
一 研究目标与内容	(86)
二 研究样本的选择	(87)
三 “@ 澎湃新闻” 新闻框架的编码与测量方法	(88)
四 “@ 澎湃新闻” 积极社会制度框架的编码与测量方法	(92)
第四节 “@ 澎湃新闻” 的积极社会制度框架的数据结果 分析	(93)
一 主流媒体 “@ 澎湃新闻” 的新闻框架分析	(93)

二 “@澎湃新闻”积极社会制度框架中的积极、消极情感	(100)
三 “@澎湃新闻”积极社会制度框架分析	(104)
四 小结	(109)
第五节 基于积极社会制度框架的主流媒体微博的舆论引导策略	(111)
一 主流媒体微博的舆论引导策略	(111)
二 研究结论与不足	(115)
第四章 核心价值传播对积极舆论主体的美德重构	(118)
第一节 网络舆论共识中的宽容美德与怨恨情绪的唤醒、重构与博弈	(118)
一 宽容美德唤醒的情境条件：价值差异比较中激活难以自解的怨恨情绪	(120)
二 宽容美德社会记忆的唤醒机制：新型主流媒体的克己美德框架	(125)
三 实现论媒介动机下舆论主体宽容美德的自觉重构及其与怨恨情绪的博弈	(134)
四 结语	(138)
第二节 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中敬畏情绪的社会记忆重构	(139)
一 敬畏情绪的社会记忆传统及其在中国的重构价值	(140)
二 突发事件传播中敬畏情绪社会记忆的唤醒与重构	(143)
三 突发事件传播误区与敬畏情绪社会记忆的重构	(145)
第三节 唤醒与认同：虚构媒介中感恩特质的社会记忆重构	(148)
一 “感恩”特质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记忆传承	(149)
二 虚构媒介中的亲恩记忆框架的唤醒与认同	(152)
三 夫妇、姐妹之恩的社会记忆唤起与当下认同	(154)

第五章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论主体的积极人格及其有序

参与 (159)

第一节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积极舆论主体的积极人格 (159)

一 积极舆论主体的积极人格 (160)

二 积极舆论主体积极人格的具体特征 (162)

第二节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论主体的有序参与 (164)

一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历史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164)

二 公民参与的国内外研究及其概念界定 (168)

三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公民参与和公民有序参与 (171)

第三节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论主体积极人格及其有序参与的

关系实证 (174)

一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论主体的积极人格特质再现 (175)

二 积极舆论主体的积极人格与其有序参与的关系 (180)

三 重视积极舆论主体的积极人格发展与有序参与 (199)

第六章 微博舆论场中积极舆论主体的积极情绪体验 (202)

第一节 微博的舆论场属性特征 (203)

一 舆论场的定义及特征 (203)

二 微博舆论场的基本特征：公共性与私人性并存 (205)

第二节 积极舆论主体的积极情绪体验 (208)

一 积极情绪体验的概念及功能 (209)

二 微博舆论与舆论主体的积极情绪体验 (212)

第三节 雅安地震事件中积极舆论主体的积极情绪体验 (214)

一 积极舆论主体的“希望”情绪体验——地震相关信息 迅疾发布 (215)

二 积极舆论主体的“激励”与“感激”情绪体验——微博 救援开展 (216)

三 积极舆论主体的“爱”情绪体验——微公益活动 (218)

四 积极舆论主体的积极情绪对微博舆论场的影响 (219)

五 积极舆论主体的积极情绪体验的策略 (224)

六 小结 (226)

第七章 有意义媒介内容对积极舆论主体品味信念的提升

效应	(228)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积极转向与品味信念发展梳理	(230)
一 传播研究消极取向的历史梳理	(230)
二 积极视角的传播研究转向	(233)
三 “有意义媒介内容”的提出	(234)
四 “品味”的辞源及多学科研究现状	(235)
第二节 有意义媒介对积极舆论主体品味信念提升效应的研究	
设计	(243)
一 研究方法简述	(243)
二 研究工具	(245)
三 研究对象	(246)
四 实际操作	(247)
第三节 有意义媒介对舆论主体品味信念的提升结果	(252)
一 舆论主体品味信念的整体状态	(252)
二 品味信念的人口统计变量分析	(254)
三 实验结果分析	(258)
第四节 有意义媒介内容对舆论主体品味信念的提升策略 ...	(264)
一 有意义媒介内容对舆论主体品味信念的提升	(264)
二 对舆论主体品味信念提升的策略性建议	(265)
参考文献	(267)
附录	(275)
后记	(294)

绪言 积极网络舆论：国家与市民 社会良性互动的媒介实践

起始于被称作“微博元年”的2010年，经过2011年的“微信元年”，直至2016年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元年”，社交媒介新技术与新媒介形态的普及与应用，使得人们的生活场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时无刻不握着手机的人们，沉浸于各种形态的媒介信息海洋与媒介关系网络中，视频的、音频的、文字的以及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形态的媒介信息在我们的指尖传递，媒介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的“朋友”：她实时（甚至仿真）地告诉我们全球正在发生的大事小情，（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因看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对赖以生存的世界发出前所未有的“忧患观照”）；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食品安全、流行病以及各种资源稀缺等对个体、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阻碍的话题，不再仅是国家、政府、企业、组织层面面临的发展压力，而成为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生存生态。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介传播为人们带来认知客观世界的场域，而认知的同时更融入情绪情感要素，尤其是对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认知，很容易发生担忧、沮丧、愤怒与怨恨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反过来对人们的认知结果起到破坏、瓦解、限制或阻断的影响。不仅如此，社交媒介也为人们提供了公共意见表达的载体，不同个体在群体中的关系与意见领袖的影响下，形成屡有发生的或从众、或集群等负面舆论宣泄现象，造成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因而，在对网络舆论的已有研究中，人们多倾向于对负面舆论规律的关注，并由此进行负面网络舆情的预警、提出舆论引导的相关策略，以抵御负面舆论的形成与负面社会影响。

我们似乎在针对负面网络事件的舆情中，忽略了积极舆论的现

象,如在2015年“8·12”天津爆炸事件中,在公众对天津媒体及事件相关部门的负面网络舆论中,同样可以看到有关对消防官兵的敬畏情绪下所形成的积极网络舆情。不仅如此,在网络舆论中,在对现实的忧患意识下,更多的公众在积极地参与有关正义、民主、平等、责任、仁爱、宽容等议题的讨论中,乐观地进行各种的关注、表达、分享与讨论,并在其中体验来自媒介环境所营造的各种积极情绪,进而累积形成促发各类亲社会的积极外显行为的动机,试图借此来为己、为人、为社会、为国家乃至世界做出有益的事情,并由此形成积极网络舆论。

舆论引导研究中多关注了针对社交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所形成的两个舆论场的对峙,以及群体性事件的社交媒介负面舆论生成演变机制,多关注了负面舆论及其负面影响,却将人性中对美好的向往中的积极网络舆论视为应然的现象与结论,而忽略了对其生成机制及其社会积极影响规律的认知与应用。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积极的网络舆论,我们或许可以从对网络负面舆论的生成规律及其负面影响的探究转而指向这样的议题:从个体层面,如何能在媒介生态中获取幸福;从国家层面,如何建构并培养积极的网络社会心态,如何在传播路径上实现与公众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积极转型。因此,积极网络舆论就成为对个体幸福、社会稳定与国家繁荣等既与个体生活息息相关,又与社会、国家的宏大叙事密不可分的议题。

一 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理论溯源

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理论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在国家建设上所秉持的重要理念。这一理论的形成起源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发展历程中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并伴随国家的演进而逐步发展而来。在西方社会的理论透视与实践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混沌不清、进展对峙与良性互动。^①

^① 荆学民、李彦冰:《政治传播视野: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中的国家理念析论——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理论基点》,《现代传播》2010年第11期。

古希腊时期，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混沌不清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尝试理解这一关系的特征与形成。其一，古希腊时期的国家以城邦出现，凡自由的成年男子都享有参与政府工作的平等权利。正如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所描绘的苏格拉底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融合的图景：“上午逛街，陪妻子，陪孩子，下午出去参加哲学辩论，参与政治讨论，投票等。”^① 在这里，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是相互融合的，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生活即是政治生活，难以将二者的关系完全剥离。马克思在回顾中世纪时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时也认为：“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② 其二，从对这一关系所依托的思想体系来判定城邦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混合性。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所提出的“知识即美德”的判断基础上，提出人必然同社会分工合作而结成国家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是自然趋向于联邦生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就是城邦的公民，城邦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一面是具有政治本质属性的公民所形成的市民社会，另一面是有足够人数的公民集团并以为公民服务为目的的城邦，一旦市民社会与城邦的政治取向与目的得以融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就必然模糊起来。此外，为当代学术界所采纳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也由于古希腊时期的这种城邦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混沌不清，是由“政治社会”这一概念所缘起的^③，正是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将政治、市民社会与国家结为一体，并为我们持续讨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带来了逻辑起点。

伴随从文艺复兴到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脉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诞生与发展，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问题随之凸显，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们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给予了持续关注，二者的关系从混沌不清发展至利益对峙。正如卢梭所认为，私有制的出现使

① [美] 诺曼·莱文：《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王今一译，《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页。

③ 肖岁寒：《市民社会的历史考察》，《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人类出现了不平等,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人们订立了社会契约,建立了国家^①,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工具。而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认为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②,这意味着作为经济领域的市民社会又是独立于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的,市民社会服从于经济体系,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洛克在这一观点的启发下进而提出“社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理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由此出现界限,孟德斯鸠和他的继承者托克维尔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是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的,社会由其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的君主制须受制于法治,而法治须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③,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中间机构在调和目的的达成中却难免唤起并促发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对峙。黑格尔进一步阐明了二者的对立关系,认为体现特殊性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在伦理上并不自足,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其加以救济^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我国学者在对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与梳理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的良性互动理论的精髓。马克思承认黑格尔所提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但是对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认识的逻辑基础给予了批判,指出是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未沿袭马克思的良性互动理论脉络,即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阐释中也过多地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峙,认为组成市民社会的学校、教会、公民团体等这些机构都被统合进了国家,为了争取市民社会的支持,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国家的触角深入市民社会,从而形成国

① 吴琦:《试论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② 洪明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和互动》,《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邓正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④ 同上。

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和冲突。为传播学者所熟识的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也承认了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领域，在市场领域和文化领域两个方面对市民社会给予深入的论证，但是其批判的焦点仍旧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峙，而非良性互动层面的建构，这与批判学派学者所身处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不无关系的。而马克思则在承认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野的同时，不止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理论，把注意力聚焦在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上，认为市民社会本身矛盾的克服在于其自身的发展，只有通过经济基础的改变从而改变社会利益关系，并最终达到公共利益的实现。^①

我国学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理论是与我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状特征是相契合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体决定了国家和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与发展走向。因而，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要以这一基本政体为依托的，这是我们从良性互动角度探索两个舆论场规律、积极舆论引导规律的出发点与研究目的所在。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市场化和民主浪潮的推进，中西方理论界对我国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讨论中，并未将理论的注意力放置于对二者良性互动关系的建构上，而是更多地沿袭了对二者关系对峙的理论基点加以批判，例如，奥斯特加德使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的理论模式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政治实践^②；也有学者针对对峙的关系的调和进行了讨论，华人学者戴慕珍使用“法团主义模式”强调了地方利益共同体的作用，黄宗智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模式，即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转型中的中国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对峙关系中如何调和的途径。

① 陈晏清等：《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南开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② 顾昕：《当代中国有无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评西方学者有关论述》，《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4期。

我国学者也进一步提出“分类控制体系”模式、“行政吸纳社会”模式^①等，试图由此来避免陷入西方民主的窠臼之中。但是，我国学者邓正来明确指出，认为这两种理论秉承实证主义路径，无法站在中国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建设高度来建构未来。邓正来进而强调不同的知识系统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遭遇，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并趋向于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却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②

基于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理论视角，邓正来进一步尝试建构出“生存性智慧理论”模式，认为“生存性智慧”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应对生活世界各种生存挑战的“智慧”，在此作用下逐步形成独特的、符合“中国理想图景”要求的市民社会发育及民主转型模式。邓正来认为，生存性智慧不属于知识范畴，但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常常是以具有当然有效性的某种官方意识形态为伪装或外衣的，那些在意识形态视域中具有有效性的各种知识都会在符合“责任伦理”的原则下与“生存性智慧”构成互动关系，甚至衍化成其本身的内容。^③回到本文所试图探寻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理论视角下进行积极网络舆论引导的议题上，笔者认为主流媒体所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为公民的价值判断提供责任伦理（以后果为导向的具体道德规则）模式，并内化为公民美德，进而默化为真正意识上的公民的“生存性智慧”，在此作用下形成积极的网络舆论，因而，积极网络舆论的形成将成为阐释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在传播路径上的理论机制，换句话说，也是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理论在传播实践中的检验，从这一理论视角看去，积极网络舆论的形成就体现为公民美德与主流媒体正能量传播的主流价值之间良性互动的某种顺应、强化。

① 康晓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版，第28页。

②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转引自邓正来《生存性智慧模式——对中国市民社会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③ 邓正来：《“生存性智慧模式”——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二 公民美德的理论溯源及其对促进舆论互动的主体价值

为了更好地理解积极网络舆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传播路径中的积极作用，我们有必要厘清什么是公民美德，这一市民社会活力的内在价值与动力源泉。公民美德这一概念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所指中包含了某些特有的假定或理智的习惯。西方对公民美德的研究先后经历了共和主义传统到自由主义观念的历史脉络。如前所述及，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处于混沌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做出人是“政治人”的假设，认为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个人的人格依赖于他从物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并进入到政治的世界中，只有通过承担军事义务和参与政治而服务于共同体，公民才真正获得作为人的价值，而承担军事义务和参与政治就被视为体现了公民美德，并且道德和善的生活也将通过履行公民美德而得到公开的表达。^①以执着追求人类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共和的卢梭，把美德称为各个人的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的协调，尽管公共意志体现并代表所有成员的利益，但每个成员的意志仍有时要和整体意志发生矛盾，这种情况下，要通过调节个人的意志使之与公共意志相一致。也就是说，公民的小我要从国家的大我出发，考虑和满足小我的愿望和要求，有时宁可牺牲个人的小我，也要保全国家这个大我。公民美德的核心和本质就是爱国思想，协调小我和大我的最灵验方法就是爱国思想，卢梭认为爱国思想产生了美德的最伟大的奇迹。

西方政治学不仅对公民美德的政治效用加以阐释，也不断论争了公民美德的内涵，诸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应有智慧、节制、勇敢和正义这四种美德；阿伦特将勇气、言行恪守边界适度、宽恕和承诺视为公民美德；拉克维尔认为现代公民美德源自个人美德，通过启蒙和引导得以形塑。我国学者对西方公民美德的现当代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引入，也强调了公民美德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如吴俊认为公民美德包括爱国主义、公民参与、正义感、宽容和文明礼貌^②。

① 朱前星：《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民美德》，《伦理学研究》2009年第9期。

② 吴俊：《论公民美德》，《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

我们追溯心理学的学术脉络时，发现作为 21 世纪国际心理学重心的、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的积极心理学对人类美德给出了概念性的界定和操作化的工具。积极心理学家彼得森和塞利格曼基于全世界主要宗教流派和哲学流派提出六种跨文化美德，即智慧、勇气、仁慈、正义、节制和超越^①。积极心理学与前述政治思想史以及政治学脉络下的公民美德尽管理论视角有所不同：前者在于与美好生活有关的人格特质；后者在共和主义传统中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公民资格”，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旨在维持公民社会正常运转的底线意义上的“社会品德”，这种社会品德不仅适用于政治活动，也适用于日常行为。但我们仍可见，积极心理学理论所建构的人类性格优势与美德的内涵与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民美德的内涵的目的趋近性，正如表 0-1 所呈现。

表 0-1 公民美德与美德优势的内涵对照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公民美德		积极心理学视野中的美德优势	
亚里士多德	智慧 节制 勇敢 正义	彼得森和塞利格曼	智慧 勇气 节制 仁慈 超越 正义
阿伦特	勇气 言行恪守边界 适度 宽恕 承诺		
吴俊	爱国主义 公民参与 正义感 宽容 文明礼貌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尤为重视美德，诸如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管仲提出“四维七体”，四维是礼义廉耻，七体是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樽诎、纤啬省用、敦螺纯固、和协辑睦。中华传统美德与西方政治学的公民美德、积极心理学的美德优势在价值内涵上也具有一定的趋近性，既兼顾了个体美德优势的重要性，又强调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规约作用。

回到笔者所要探讨的积极网络舆论议题上，如前所述，积极网络

^① [美] Peterson, C., & Seligman, M.,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

舆论实质上是在传播路径中主流媒体所传播的主流价值与市民社会中积极舆论主体的公民美德形成良性互动的必由之路与结果。这里的“公民美德”不再只是西方政治学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公民美德”与“美德优势”，而是糅合了中国传统美德在内的“公民美德”；主流媒体所传播的核心价值具有对公民美德的社会记忆的唤醒、认同与重构的作用，通过沉浸、品味与升华等积极心理机制，在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的引导下，公民美德进而内化为公民的积极应对生活世界挑战的“生存性智慧”，从而形成积极的网络舆论场，促发一个有序的、独特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